

臺灣社會學刊 第28期 (增刊)  
2002年9月 頁201-210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No. 28 (supplement), September 2002

## 批評與回應

# 評論：人性、文化與社會實在的另類詮釋

Comment: Human Nature, Culture, and Social Reality  
— 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

張震東\*

致謝：

本文原為稿件評論，初無公開之意，故用心所在以達意為主，對文章規格無甚斟酌。今既應主編熊瑞梅教授之邀刊登，乃依學刊撰稿體例在格式上稍作修改，文章內容實質上則保留原貌。主編盛意在此一併致謝。

\* 張震東 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教授

Andrew Chen-Tung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Welfa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這是一篇牛肉很多 (meaty)、思想性很高、跡近小品文 (essay) 的學術論文。從其行文措辭讀者可以清楚感受到作者寫作時內心的悸動，而其論述方式較特別（「談論到此，有一個重要的課題……」，「那麼，這些客觀條件是甚麼呢？」），很有娓娓道來、引人入勝的趣味。作者論文主題—西方（舉世？）社會學界論述從以生產為主軸的政治經濟學（應？）轉向到以消費為主軸的文化經濟學—顯然相當程度上借重 Appleby 的見解，同時廣泛徵引其他學者與思想家的著述以為佐證。所論足以自成一說，且與當前國外頗盛行的某種思潮又相當吻合，值得學圈內外讀者的共賞。

作為稿件的評審人，對全文拜讀再三（絕非客套話）之餘，理當提出一些不同的見解，或許作者願意略加斟酌。茲細述如下：

### 一、作者的人性論或「人學」(anthropology) 觀點

作者說，「人類所以透過使用工具……其目的為的無非是滿足人類所具諸多之需求或需要的慾望，……倘若以這樣的基本心理要求做為一種哲學人類學的預設要件來看的話，這無疑地可以用以證成『消費現象乃整個經濟活動的終點』這樣的說法。」

作者一開始就宣稱生產的目的在於滿足人的需要或需求，而需要的滿足就是消費。作者顯然認為這是再清楚不過的真理。這樣的論述意味著作者認定人所需求的是消費。且撇開生產與消費環環相扣的關係不談，這樣的人性觀顯然跟 Marx 的人性論成為強烈的對照。Marx 認為人天生有一股創生的內力 (inherent generative force)，極力要在生產（廣義的）與創造中發展實現 (actualize) 其天生的潛力 (capacities, powers)。除卻這人性論的預設，Marx 的異化論將毫無意義。所以，對

Marx 而言，「生產」，而非「消費」，才是人的最核心也最強力的需要。

作者或許會說，這差別正好為其論文主旨提供多一項佐證。這話說得過去。但是，首先，若要帶入這一論點，作者的行文措辭顯然就得作適當的修改。具體而言，人性論應該是論題之一，不應該是論文一開始的預設。其次，Marx 這種「生機／活力論」(Vitalist) 的人性觀來自 Hegel，更可遠溯到古希臘的 Aristotle 等人。作者將如何對這一點作回應？

作者將需要的滿足等同於消費，這觀點放到對 Marx 理論的詮釋上還牽涉到了這個問題：作者提到 Marx 將所謂「使用價值」抬到至高無上的指導綱領地位。是否確實如此，應該有不同詮釋的空間。但有一點可以確定的倒是：Marx 的「使用價值」理念是扣緊人的「需要」而立論的：東西的「使用價值」無非是其所以滿足人的具體需要的性質及因此而衍生出的對人的價值。因此，若依作者的概念上的設定，以需要的滿足就是消費，那麼，高舉「使用價值」豈不等於強調「消費」？

由於討論到 Marx，就衍生出下面的歷史詮釋的問題。

## 二、歷史詮釋的問題

作者文中指出，早在十八世紀末，Adam Smith 就認為消費是生產的唯一終點和目的。姑再撇開生產與消費環環相扣的論點不談，由 Adam Smith 開展出來的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始終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裡的思想主流，也正因為如此，Marx 才必須費盡多年的研究與思索，撰寫《資本論》以為批判。Marx 自認其政治經濟學的最大貢獻在於把分析重點從市場上的交易過程轉移到生產點上，因為唯有在這裡才能挖掘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本問題：剝削與異化。Marx 在社會學

中的崇高地位自然不容質疑，以他的著作為例來說明更方便作者論點的證立，但 Marx 在作者論述的這歷史階段裡的政治經濟學界、以及一般思潮中，是否可做為代表人物，恐怕會有爭議，而就作者論旨而言，所選例子必須具時代的代表性，自不在話下。當然，作者也曾提到，「回顧西方社會思想史的發展，分配作為一種社會互動關係的表現形式，它總是緊扣著生產（而不是跟著消費）一起被抬了出來。」就這一點而言，單是如此的宣稱，未佐以文獻的徵引，恐怕不易取信。特別是作者接著提到「分配正義」，並再度認為這課題與生產緊扣在一起，這一點很難令人接受，因為按一般的理解，「分配正義」似乎比較跟「消費」扣連在一起。至於「分配正義」並非如作者所說，「始終」是個重要的核心課題（「分配正義」，無論是涉及生產或消費，恐怕直到十九世紀以前，都僅屬於 Edmund Burke 所謂的政府的「lower responsibilities」的範疇，並非政治哲學上的核心課題；而 Hayek 以「社會正義」觀念為子虛烏有（mirage），當是作者所熟悉的），因為這議題並非論文關鍵所在，就此略過。

### 三、文化概念的詮釋及其相關論述

作者在鋪陳其文化經濟學觀點時，對「文化」概念的內涵有其特殊的詮釋。基本上，作者把文化的內涵不僅侷限在具有象徵意義的製造物（即不單單只具有「使用價值」而已），而且窄化到「風尚」、「流行」、「品味」等純粹象徵的符號層面。如此詮釋「文化」之後，再配合上 Baudrillard 的名言：「要成為消費的對象，物品必須先成為符號」之後，「文化」遂被歸為「消費」的範疇，而「文化產業」所生產與再生產的就是這類符號的消費品。最後，「文化經濟學」就成為這類消費行

為的經濟學（為甚麼是經濟學？）的研究。

從科學哲學立場看，界說／定義本身無所謂是非對錯；作者當然有充分理由可以依其論述需要界定其概念。但是，為了理論立場而窄化概念，若沒有足夠令人信服的理據，恐難免有 Bourdieu 所謂的「符號暴力」之嫌。「文化」一詞的習慣用法有幾層意思，若採 identity-difference (the dialectic between what is and what is not) 辯證方式界定，「文化」首先與「自然」對照：「文化」泛指屬於「自然」範疇以外的事物，這一向是人類學의 用法。其次，「文化」可與「社會結構」對照，指人際互動過程中符號／象徵層面的東西，這比較上是社會學者的用法。兩者是社會科學學者所習慣的「文化」的本體論概念。無論是前者或後者，「文化」的內涵絕不僅限於消費面的事物。換言之，即使我們姑且接受 Baudrillard 「要成為消費的對象，物品必須先成為符號」的說法，其 converse：「凡具有符號／象徵意義的事物都屬消費的對象」並不成立。所論如果還有些道理，則不僅「文化經濟學」一詞，即「符號／象徵經濟學」一詞是否可以精準表達作者所要彰顯的理論觀點，恐都還值得商榷。

另外，「文化產業」一詞當初在批判理論中所強調的是 ideology, hegemony 等的議題，重點放在文化產品的製造與傳播的掌控議題上。作者將它放在消費範疇來理解，自有一番新意。但是，作者對於文化產品之意識形態的意涵的漠視，可能是作者沒有考慮另類詮釋的可能的原因。這牽涉到整個理論觀點的問題，等在下面稍加細說。

#### 四、另類詮釋：一以貫之的政治經濟學觀點

其實，作者為了證成其論旨所做的論述本身就可說是政治經濟學的

分析。作者自己承認「資本主義社會體系產生了綿密而細緻的自我防衛能力」，而且，「整個資本主義的文明發展至今，諸多社會結構性的變遷又是變本加厲，這更是終於有著極為有力的條件促使『消費』被當做為證成自由的基本指標」。依我所見，這裡埋藏著一個另類詮釋的可能；而作者引用 Bauman 的話說，「處在消費階段的資本主義體制，不但已不再壓制人類追求快樂的傾向，而且利用這種傾向來維護自身的存在。」則這另類詮釋的軸線是政治經濟學觀點，似乎再清楚不過了。

依此另類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在的異化與剝削的問題，使它不斷地必須為自己辯護、提出理據。資本主義體系之所以必須有「綿密而細緻的自我防衛」的努力原因在此。資本主義發展的第一階段，是資本主義充分展現其最大優點—即 Marx 所指稱的、社會生產力史無前例的快速擴張—的階段。雖然生產力的大力開拓為人類帶來了龐大無比的財富，但這財富是在一個 Schumpeter 所謂的、創造的摧毀過程中製造出來的，所以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是貧窮（pauperism）與繁榮（prosperity）的同時俱增（Cf. Polanyi 2001）。在這種情況下，既得利益的資產階級除了強調這體制的優點—所以有作者觀察到的以生產為主軸的論述—之外，就是藉由工資形式（wage-form）強調（勞力）市場中既有「平等」又有「自由」的古典自由主義所津津樂道的論述。這意識形態對於資產階級固然多少發揮了自我安慰的作用，但對於許多勞工階級顯然無甚奏效，所以我們才看到了十九世紀以來無數的政經取向的社會運動。

消費的凸顯與強調可理解為資本主義體制在主要是它所製造的客觀條件的發展成熟的階段用來補充上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不足的地方。這裡所謂的主要客觀條件包括社會財富進一步的積累，生產組織結構的改變（如 labor process 研究中所謂的對勞工的宰制從 formal 到 real 的轉變，the transformation from formal to real subordination of labor），以及隨

之而來的中產階級的興起與擴大，乃至於後來東西方的對峙等。這項轉變在主觀的意識形態上的表現是工作者（workers）的自我概念從工作者／生產者轉變為工作者／消費者（Postone 1993:181, 132n），以及作者文中所描述的諸多現象。在此另類詮釋中，「意識形態」的理念顯然居於一個關鍵的地位。下節略加說明。

## 五、意識形態的問題

Marx 後期社會本體（構成）論的特點，受到 Hegel 《大邏輯》（*The Science of Logic*）的影響，在於認識到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具有兩個層面：表象／現象（appearance）與內在實體／本質（inner reality, essence）。Marx 的意識形態論是建構在這社會本體論之上的。簡言之，按 Marx 的論點，意識形態是社會實在這兩層面之間「顛倒」（inversion）關係的「必要」與「必然」產物，其作用即在於遮蓋掩飾這「顛倒」的矛盾關係，使人僅看到表象、看不到內在實體。這作用就是資本主義體制的一個自衛機制（Cf. Larrain 1983; Ricoeur 1986）。上述藉由工資形式以「彰顯」市場交易關係上的「自由」與「平等」，使人看不到生產關係裡的剝削與異化，便是一例。而消費的凸顯與 consumerism 的興起也可作如是觀：在生產方式基本上維持不變的情況下，使得人們仍然同意、甚至很樂意地繼續努力工作，從剩餘價值中製造利潤（Cf. Burawoy 1979）。換言之，按此觀點，消費的「自由」與消費至上的理念可視為新階段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表象與伴之而來的意識形態。

消費至上的理念與中產階級的自滿（complacency）乃是資本主義體制的表象，其核心實體依舊是資本與生產。這一點在當前的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的第三階段發展中已經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眼前。資本主義

生產以及金融資本的全球化很殘忍地打破了中產階級以消費為自足的幻夢。與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相抗爭的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上活躍的難道不多是白領的中產階級嗎？而 Neoliberalism 的甚囂塵上，大力鼓吹全球化，豈不是在呼應資本主義體制新發展階段意識形態上的需要（Bourdieu 1998）？這裡彰顯這另類詮釋的可能，用意不在否認消費現象的重要性，而在於堅持生產面的基礎性。但是對此消費現象重要性的強調，大約類似當年法蘭克福學派對於意識形態重要性的（重新）體認一樣。批判理論之所以關心「文化產業」，即出於對 ideology 與 hegemony 等議題的重視；重點放在文化產品的生產與傳播的掌控上。Consumerism 與意識形態，按照 Marx 的社會構成論，儘管都屬於表象（appearance）層面的東西，卻也都是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的一部分，是任何周全的社會分析所不可置之不顧的。這是 Marx 的「社會實在」以及「表象」理念非常獨特的地方。

不可否認的，Marx 的表象與本質的二分以及相扣連的意識形態理念，在認識論與方法論上都有非常棘手的問題需要深入探討，但這不在本評論的範圍內，所以不再多言，就此打住。

## 六、理論觀點與存在意義的抉擇

作者對於他所看到的從「政治經濟學」到「文化經濟學」的轉折似乎在生存意義層面上（existentially）有一份內心的掙扎（ambivalence）。單從摘要、尤其是英文摘要看，作者本文的目的似乎僅在於從純粹學術的「客觀」立場陳述一項歷史的「實然」的發展。然而從本文最後一兩頁裡的行文措辭裡卻似乎可以感受到作者對這歷史命運的一份「疏離」與「無奈感」。這裡我們似乎聽到作者由於「實然」與



「應然」的落差從其內心發出的幾聲慨嘆。我說這篇論文跡近抒情的「小品文」，原因在此。

其實，在科學哲學反省的最深層，我們不難體認到，理論（方法論）觀點的挑選與信持都是個人存在意義的抉擇（若以英文表達，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The choice of and commitment to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is an existential decision）。無論當事人意識到與否、或情不情願，這抉擇固然無以全然跳脫當時文化與社會結構的把持，但人自我意識的存在終竟意謂著超越的永遠可能。這可能的存在標明了社會學的極限，但社會學的最終目的與最高貢獻卻也就在於體認人的這極限，因為說到底，這極限體認之可能終竟方是人真正自由—若果真有其事（對這事的肯定與否也是個存在意義的抉擇，其是非對錯並非經驗或理性甚至兩者的兼用所能判定的）—的端倪、因而也是其終極基礎。

## 總結

以上是對於作者論文中若干主要關鍵點的一些意／異見。

這些論點將作者文中潛在的一個觀點提升為一個另類詮釋，並帶進Marx的「意識形態」理念使它成為可以自圓其說的論旨（thesis）。如果容許以多少簡化的語言出之的話，作者採取的是韋伯式的（Weberian）分析架構，該理論架構不容有Marx的「社會實在」與「意識形態」的理念。這是兩者之間關鍵性的哲學上的差異（新康德學派 vs. 黑格爾的辯證哲學）。以上這些思索只在於顯示一個不同觀點的可能，無意也不足以推翻作者的論旨及其理論觀點。無論如何，正如一開頭就說明的，這是一篇值得讀者細讀反思的難得的小品文似的學術論文。至於文中其他細節上或有爭議的論點與措辭，這裡就不細列了。

### 作者簡介

張震東，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系執教有年，現為國立中正大學社會福利系教授。研究興趣在社會理論、歷史社會學與社會哲學。目前研究以「托克維爾的社會理論」，「Civil Society 的理念與歷史」，以及「公義，關懷，與福祉」為主。

### 參考書目

- Bourdieu, Pierre, 1998, *Acts of Resistance: Against the Tyranny of the Market*,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The New Press.
- Burawoy, Michael, 1979, *Manufacturing 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rrain, Jorge, 1983, *Marxism and Ideology*. London: Macmillan.
- Polanyi, Karl,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with Foreword by Joseph E. Stiglitz and Introduction by Fred Block. Boston: Beacon Press. [Earlier editions 1944, 1957]
- Postone, Moishe, 1993, *Time, Labor, and Social Domina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Marx's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Ricoeur, Paul, 1986, *Lectures on Ideology and Utopia*, edited by George H. Taylor.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